

◆文旅纵横◆

红色旅游与乡村振兴协同发展研究 ——以漳州市为例

原志刚，刘沧

(厦门大学 嘉庚学院，福建 漳州，363105)

【摘 要】红色旅游发展至今在助力乡村振兴方面作出了很大贡献，但是由于红色资源众多，分布广泛，很多处于偏僻地区、知名度不高的红色旅游景点在与乡村振兴协同发展上的作用并不明显。文章以漳州市为例，结合文献研究和问卷调查结果发现，乡村红色旅游景点存在多重管理、影响力小、旅游时间具有周期性、内容严肃、配套服务设施不够完善等问题。因此，红色旅游与乡村振兴协同发展不能仅仅依赖单向的“红色+”，而应将“红色+”和“+红色”相结合，依据根植性理论和新内生发展理论，以内生发展“造血”机制为主，外生发展“输血”机制为辅，按照乡村“五个振兴”发展框架，将红色旅游融入乡村发展，通过组织协同、人才协同、产业协同、文化协同、生态协同实现中国乡村“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

【关键词】漳州；红色旅游；乡村振兴；根植性；新内生发展

【基金项目】2024年度漳州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课题“漳州红色旅游与乡村振兴协同发展研究——基于根植性和新内生发展理论视角的分析”(LX24302005)；厦门大学嘉庚学院科研孵化项目“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论阐释与实践应用研究”(YM2022W06)。

【作者简介】原志刚，厦门大学嘉庚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组织及人力资源管理；刘沧，厦门大学嘉庚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文化旅游资源开发。

中图分类号：F327 文献标识码：A

引言

红色旅游自2004年被提出后，2016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颁布的《2016—2020年全国红色旅游发展规划纲要》、党的十九届

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等政策文件均提出要发挥红色旅游的教育功能和脱贫攻坚作用，支持革命老区立足红色文化、民族文化和绿色生态资源，加快实

施乡村旅游富民工程,积极推进老区贫困村旅游扶贫试点,将红色旅游与乡村振兴相结合实现协同发展,到2035年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形成红色文化繁荣、生态环境优美、基础设施完善、产业发展兴旺、居民生活幸福、社会和谐稳定的发展新局面,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红色旅游与乡村振兴要共同发展,然而,目前的研究文献几乎全是单向研究红色旅游对乡村振兴的引领作用和实践路径,鲜有对乡村振兴如何促进红色旅游效果的研究。从多方面调研统计数据看,红色旅游对乡村振兴确实作出了很大贡献。比如据《中国红色旅游发展报告(2023)》显示,全国红色旅游接待人数已经突破20亿人次,红色旅游市场规模接近万亿元。但是不可否认,全国各地在发展红色旅游的过程中仍然还存在很多问题,比如,目前全国各地囿于资金和能力等各方面主客观条件限制,主要侧重对城市和知名度高的红色旅游景点进行开发,那么,其他更多位于偏僻乡村地区的红色旅游景点该如何进行保护和开发?这类红色景点既无法带动乡村振兴,又受限于自身禀赋。值得注意的是,红色旅游与乡村振兴是双向“奔赴”的关系,红色旅游可以促进乡村振兴,乡村振兴也可以促进红色旅游的发展。我们不仅要研究红色旅游如何促进乡村振兴,也要研究乡村振兴如何提升红色旅游效果。

以福建省漳州市为例。福建省漳州市属于革命苏区老区,全市11个县(区)有8个苏区县,革命老区村790个。截至2024年6月4日,漳州市105处不可移动革命文物中被列入国家级、省级和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分别仅有3处、25处和5处,其余皆是知名度和影响力小的县级文物。另外,尚未被列入革命文物红色文化遗存还有473处。本文通过漳州市人民政府、发展改革委、教育局、自然资源局、生态环境局、农业农村局、文旅局、统计局等官方网站查询,均未搜索到与漳州市红色旅游有关的统计数据,最近的相关新闻是

漳州市人民政府网站于2022年4月11日发布的《漳州旅投集团将与漳浦县共同打造车本红色旅游项目》。在文献研究方面,目前有关漳州市红色旅游与乡村振兴协同发展方面的文章很少,几乎全部采用的都是比较浅层次的定性和个例研究。

基于现有关于漳州市红色旅游与乡村振兴协同发展方面的研究文献缺乏深度的定量分析和整体研究,本文拟首先从旅游视角,通过文献研究,结合线上问卷调查手段,深入探讨漳州市目前红色旅游本身及在带动乡村振兴方面存在的问题,然后根据欧美、日本等国家乡村脱贫的经验教训,以根植性理论和新内生发展理论为基础,在我国乡村振兴促进法提出的乡村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和组织振兴政策框架下提出漳州市红色旅游与乡村振兴的组织协同、人才协同、产业协同、文化协同和生态协同改善建议,通过将“红色+”和“+红色”相结合,乡村自身的“造血”机制和外来资本、人才、品牌等“输血”机制相结合,进一步促进漳州市红色旅游与乡村振兴的协同发展。

一、漳州红色旅游及带动乡村振兴现状调研

(一) 问卷调研设计

本文将问卷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基本信息,包括性别、年龄、职业/身份、学历、常住地址等。第二部分为问卷的主体部分,包括游客行为和游客满意度调查。游客行为调查全部为单项或者多项选择题,主要了解:①游客去漳州红色旅游景点参观的原因,②时间及时长,③餐饮、住宿、购物方面的花费,④去漳州乡村旅游花费的时间;游客满意度主要了解:①游客对漳州红色旅游景点交通条件、停车条件,②宣传方式、内容展示方式、景点介绍、讲解人员的专业程度、宣传内容,③红色文化教育效果,④景点线路指示,⑤餐饮、住宿、公厕配套设施,⑥卫

生状况,⑦周边产品开发情况,⑧与当地产业的融合情况,⑨红色文化与当地民族文化、宗教文化等融合情况,⑩生态环境保护和开发情况,⑪和周边景点的联动情况。该部分问卷全部为封闭式问题,运用李科特五级量表,用1~5分表示非常不满意、不满意、一般、满意和非常满意。另外,还调研了近些年乡村红色资源的开发是否有效推动了乡村振兴工作的开展。第三部分为开放式问题,主要了解游客对漳州红色旅游景点保护、开发及与乡村振兴协同发展的意见、建议。本次调研通过问卷星进行问卷设计,采用微信、QQ等线上发放问卷的方式进行。

(二) 数据分析

本次调研于2024年7月26日至2024年9月6日进行,共收取问卷412份,剔除无效问卷后有效问卷323份,问卷有效率为78%。受访者性别方面,男性、女性分别占比50.46%和49.54%,比例非常接近。年龄方面,中青年人数占了绝大部分比例,90后及以下和80后、70后合计分别占比48.3%和50.15%,60后及以上仅占比1.55%。职业及身份方面,单位职工和学生是本次调查的主要人群,单位职工占比最高为45.2%,其次是学生占比41.49%,自由职业者、退休人员和其他身份分别占比10.22%、3.1%。学历方面,本科及以上学历的人群占比比较大,本科学历的人数占比最多为62.23%,其次是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占比24.77%,大专学历、高中或中专学历、初中及以下学历的人数占比分别为11.46%、0.93%和0.62%。常住地址方面,漳州市和漳州周边地区的人数占据了绝大多数。漳州市是被调查者常住地址的首选,占比为39.94%;其次是漳州周边地区(厦门、泉州),占比28.79%;福建省其他地区和其他省份分别占比为15.48%和15.79%。

通过对问卷信效度进行分析,整体信度Cronbach α 系数为0.864,说明该问卷具有较高的内部一致性,即各个项目之间具有较高的相关性,可

以作为一个整体来衡量研究对象的特定特征或态度。整体效度KMO值为0.932,累积方差解释率达到79.35%,说明研究数据非常适合提取信息,所选因子能够较好地解释问卷中的变量。经过对问卷数据进行整理结合文献研究,漳州市红色旅游以及红色旅游在带动乡村振兴方面存在以下问题。

一是红色旅游景点多重管理现象严重。首先,部分红色旅游景点分属宣传、文旅、文物、党史、教育、民政、住建、纪委监委、军事等不同部门管辖,归口复杂,管理权力分割,管理机制不够健全,缺乏统一性和整体性,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红色资源低水平建设等情况,加大了区域红色旅游品牌打造的难度^[1]。其次,大部分红色旅游景区都是独立发展,出现重复开发、单调雷同、特色不足等问题。本次对漳州红色旅游景点和周边景点的联动情况调查结果显示,66.25%的受访者表示了一般,表示满意和非常满意的占28.79%,表示不满意和非常不满意的占4.95%。最后,红色旅游景点与乡村旅游缺乏高效协调联动机制,融合深度不够,未能把参观的游客成功引流到所在乡村的其他旅游项目上,资源的区域共享性不强。红色资源所在的乡村处于服从者或者配合者的角色,村民的利益诉求得不到重视,降低了村民积极、主动参与的热情。本次有关漳州红色旅游景点与当地产业的融合情况调查结果显示,64.71%的受访者表示一般,满意和非常满意的占29.72%,不满意和非常不满意的占5.57%。

二是红色旅游景点影响力小。首先,红色旅游景点整体处于多而散的状态,景点和景点之间距离较远,地理位置偏僻,关联度较低缺乏联动规模效应和资源整合。其次,很多红色文化遗址规模比较小,单一红色景点游览时间短,难以吸引游客为此单独前往。如果一天连续参观几个景点路线又太长,很多时间都花在路上,加大了游客的出行成本,舟车劳顿也容易让人疲劳,降低人们的出行欲望和参观兴致^[2],给红色旅游景区游

客数量增长带来了困难。本次问卷调查结果显示, 80.81%的受访者在漳州红色旅游景点参观的时间为2小时以内, 参观时间超过2小时的占比仅为19.2%。去漳州市乡村旅游顺便参观红色旅游景点和单位组织活动专门去红色旅游景点参观的人数占比分别为59.44%和19.2% (与下面自己感兴趣专门去参观的18.27%和其他原因去参观的3.1%合计为100%)。再次, 受资金、条件所限, 很多红色旅游景点未能得到很好的保护和开发, 红色文化内涵挖掘不够, 内容单薄且一般都是以静态简单的历史遗物陈列和图文展示为主, 缺乏深度旅游体验产品, 可参观价值不大, 难以吸引游客的兴趣, 使经济效益大打折扣。本次对漳州红色旅游景点宣传的内容满意程度调查结果显示, 受访者表示满意和非常满意的比例为54.8%, 表示一般的为43.03%, 表示不满意和非常不满意的为2.17%。对漳州红色旅游景点的内容展示方式, 53.87%的受访者认为一般, 表示满意和非常满意的占43.65%, 有2.48%的受访者表示不满意或非常不满意。最后, 红色旅游资源缺乏整体规划, 红色资源点周边缺乏集群景观或者配套的系列性旅游项目, 难以满足游客多层次的旅游及餐饮、住宿等需求^[3], 带动乡村其他产业的发展。本次问卷调查结果显示, 游客去漳州乡村旅游, 62.54%的人会选择停留1~2天, 27.24%的人选择当天往返, 仅有10.22%的人选择2天以上。

三是红色旅游存在周期性。红色旅游受市场和政治环境的影响较为明显, 发展过程呈现规律明显的淡旺季特征, 出行人流量会根据市场因素和国内纪念日活动出现波浪式起伏^[4]。中国旅游研究院和马蜂窝自由行大数据联合实验室发布的《中国红色旅游消费大数据报告(2021)》显示, 寒暑假、国庆节是红色旅游出行高峰, 高峰期出行人数占全年总出行人数的45%。本文问卷调查结果也显示, 选择在法定节假日和学生寒暑假去参观的人数占比分别为33.44%和17.34%, 合计达到

50.78%; 随时想去就去的占比最少, 仅为14.86% (和下面单位组织活动时去参观的34.37%合计为100%)。

四是红色旅游存在严肃性。人们外出旅游是为了在长期紧张学习工作之余放松身心和愉悦心情, 但是红色旅游景点因其自带的政治属性, 形式主要以馆藏物品展示和宣讲为主, 理论内容偏多, 氛围过于严肃, 游客的参与性和体验性不强, 难以提起参观者的兴趣。即使红色旅游景点采取多种创新方法进行科普教育, 也难以使广大人民群众对历史感同身受, 娱乐性远远大于教育性。本次对漳州红色旅游景点的参观时间调查结果显示, 34.37%更倾向于在单位组织活动时去参观, 因此目前红色旅游消费市场相对单一, 主要以公费学习为主, 参加红色旅游的大多为单位组织的集体活动^[5], 更多是出于政治目的和组织要求而非旅游目的和本心需要。参观人员大多数为军人、学生和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员工^[5], 对自助旅游者特别是青年旅游者群体的吸引力较弱^[6], 以个人兴趣为目的, 自发参与乡村红色旅游的游客较少^[5], 在本次问卷调查中仅占18.27%。

五是红色旅游景点配套设施不够完善。首先, 交通不够发达。很多乡村红色旅游景点除了周边群众或者特意搜索外很少有人知道。旅游目的地的可达性是旅游者开展旅游活动必须考虑的因素之一。“要想富, 先修路”, 交通等基础设施是发展旅游业的基础。交通基础设施水平越高的地区, 旅游目的地可达性越高^[7]。“途牛”网发布的《2021年度乡村旅游消费报告》显示, 自驾是用户结伴出行的首选, 出游半径则以周边3小时以内的路程为主。伏恬舒^[8]在调查游客对汝城沙洲红色旅游景区的出游意愿时发现, 在60%愿意去的游客中因为距离近、出行方便的就占到41% (2022)。红色旅游热门景点主要分布于交通发达地区也充分说明交通运输条件对红色旅游产业的影响^[4]。不过, 根据本次问卷调查结果显示, 大多数人对漳

州红色旅游景点的交通条件还是满意的,满意和非常满意的比例达到69.66%,而不满意和非常不满意的比例仅为3.1%,表示一般的为27.24%。其次,很多红色旅游景区由于分布在偏远山区和农村地区,经济薄弱,景区建设简陋,缺乏游客服务中心、厕所、住宿、饮食、网络等良好的配套设施或服务。《中国红色旅游发展报告(2023)》西安交通大学课题组针对全国多地红色旅游景区的开发状况进行了深入调查。在4000余人次参与的交流反馈及调查问卷中,有48.76%的人认为开发情况一般。其中,40%左右的受访者认为,红色旅游景区在基础设施和交通便利性(41.77%)、餐饮和住宿条件(39.24%)方面做得不够。本文本次对漳州红色旅游景点的停车条件进行调查,56.04%的受访者认为停车条件一般,感到满意和非常满意的占比41.8%,感到不满意和非常不满意的为2.17%。对漳州红色旅游景点内的线路指示,51.39%的受访者表示一般,47.99%的表示满意和非常满意,0.62%的表示不满意和非常不满意。对漳州红色旅游景点的卫生状况,57.28%的受访者表示一般,满意和非常满意的占41.18%,不满意和非常不满意的占1.55%。对漳州红色旅游景点的服务态度,68.12%表示了满意和非常满意,表示一般的占30.34%,表示不满意和非常不满意的占1.55%。对漳州红色旅游景点的公厕配套设施,63.16%的受访者表示一般,满意和非常满意的占34.36%,不满意和非常不满意的占2.48%。对漳州红色旅游景点的住宿配套设施,67.8%的受访者表示一般,满意和非常满意的占29.72%,不满意和非常不满意的占2.48%。对漳州红色旅游景点的餐饮配套设施,64.4%的受访者表示一般,满意和非常满意的占30.96%,不满意和非常不满意的占4.64%。

总之,红色旅游可以带动革命老区的经济发展,但整体的经济效应还无法与其他旅游类型比肩^[9],在带动乡村振兴方面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比

如,本次问卷调查受访者在参观漳州红色旅游的观感如下:餐饮方面,花费在100元以内的受访者占比为49.54%,101~200元的占比为40.56%,200元以上的占比仅为9.91%;住宿方面,花费在100元以内的占比32.51%,101~200元区间的占比42.41%,200元以上的占比25.08%;购物方面,花费在100元以内的占比47.37%,101~200元区间的占比42.41%,200元以上的仅占比10.22%。64.09%的受访者对漳州红色旅游景点周边产品的开发情况表示一般,表示满意和非常满意的占32.2%,不满意和非常不满意的占3.72%。有关对近些年漳州乡村红色资源的开发是否有效推动了乡村振兴工作的开展问卷调查结果显示,59.13%的受访者认为推动效果不明显,36.23%认为比较有效或十分有效,有4.64%表示不了解。因此本文认为,红色旅游与乡村振兴二者协同的关系不一定非得是“红色+”,也可以是“+红色”。对知名度高的红色旅游景点“红色+”可以带动乡村整体发展,而对于很多处于乡村知名度低的红色旅游景点可能更适合“+红色”,以乡村振兴带动红色旅游开发。漳州市各乡村可以根据所在地红色旅游景点的规模、知名度、乡村资源等因素决定是以“红色+”为主,还是“+红色”为主,将二者基于根植性理论和新内生发展理论进行有机结合,既可以通过开发红色旅游景点助力乡村脱贫致富,又可以通过乡村振兴提高红色旅游客流,深化红色资源的教育功能。

二、红色旅游与乡村振兴协同发展的理论基础

(一) 根植性理论

“根植”顾名思义为扎根、植入的意思^[10]。根植性(又称嵌入性, embeddedness)是指一个地方的经济产业充分与当地的自然资源、经济、社会、文化、历史、制度、地理区位等要素紧密结合^[10-11],完成本土化改造形成自己的特色。地方的

资源、文化、技术和社会资本基础等各种元素往往是前人留下来并代代传承的，他们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也可以作为一种财富继续流传下去，并随着时间的演变而逐渐稳定，在区域发展中发挥壁垒作用，因此根植性具有独特性、网络性、继承性、发展性等特点^[12]。根植性作为经济社会学中的概念，由匈牙利的哲学家、政治经济学家卡尔·波兰尼（Polanyi）在20世纪中期提出，认为人类经济根植或缠结在经济或非经济的制度当中，在分析经济的有效性时，宗教和政府等非经济制度可能像货币制度或减轻劳动强度的工具与机器的效力一样重要^[12]。此后，社会学家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r）在1985年进一步对该概念进行了完善，将根植性分为结构根植性和关系根植性，认为经济行为受相应的社会环境和结构的影响，并将根植性应用到对经济生活的分析当中^[13]，提出经济活动是深深地根植在网络与制度等社会关系中的。在此基础上，美国教授沙龙·祖金（Sharon Zukin）与保罗·多明戈（或保罗·迪马吉奥，Paul Dimaggio）又将根植性概念拓展为结构根植性、认知根植性、文化根植性和政治根植性^[12]。我国研究学者付晓东（2017）^[12]、范斌（2018）^[13]认为根植性的表现形态主要包括自然资源、地理因素、历史要素、文化传统、社会制度、社会结构等等。郭磊（2022）^[14]认为根植性可分为组织、认知、文化、政治、地理和社会关系等六种形式。

根据文献检索，目前尚没有发现基于根植性理论对红色旅游和乡村振兴方面的研究，与旅游相关的主要是关于文化旅游产业集群、特色小镇等方面的探讨。比如：王佳琪等（2018）^[11]以辽宁省庄河市大郑镇为例研究特色小城镇产业规划时将根植性划分为自然资源、地域文化、社会资本、地理位置四种；陈晓敏、袁波、张海熔等^[10]以成都市龙泉驿区洛带镇为例研究文旅产业的地域根植性时将根植性划分为文化根植、经济根植、制度根植以及社会根植四个维度；郭磊（2022）^[14]

以苏绣小镇为例研究特色小镇创新发展时将根植性划分为结构、产业、文化和制度四个方面等。

（二）新内生发展理论

“内生”原指植物学中某种如单叶植物在不受外在条件影响下从茎的内部生长出与母茎相同的新个体的生命现象，后来被其他学者移植到社会现象的研究^[15]。新内生发展理论在西欧和日本等国家乡村振兴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从外生发展到内生发展再到新内生发展理论的道路演进。

最初欧美、日本等国为了解决乡村地区的贫困问题，纷纷采用政府和资本等外部力量介入的外生发展模式。外生发展模式以自由资本主义为哲学基础，外来资本因其逐利的本质将农村发展简单地设定在经济增长这一狭隘的视域内，形成了以经济理性为主导的“利益治理”。资本和项目下乡凭借强大的关系网络和社会资源嵌入乡村治理，以逐利导向和分利秩序的市场逻辑取代熟人社会、人情道德、村社理性等乡土逻辑，致使农村在发展过程中深陷主体迷失、主体依附与作用异化困境，直接或间接导致了村庄内生秩序失效、村民话语权下降、贫富差距居高不下等问题^[16]，给乡村埋下了独立性丧失、环境破坏和资源枯竭等隐患^[17]，最终导致农村面临空心化、边缘化以及衰竭化甚至随时面临着被抛弃的命运^[18]。

20世纪70年代初，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针对外生发展模式的弊端提出了强调平等、自由和经济民主化等内部因素在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的五点共识，成为内生发展思想的雏形。1975年，瑞典哈马绍（Dag Hammarskjöld）财团在联合国发表的一份关于“世界的未来”的报告《我们现在怎么办（What Now）》中首次提出了“内生发展（endogenous development）”概念，从经济学、政治学视角探讨了内生发展因素对欠发达国家发展的影响^[19]，重点关注地方如何利用各种本土资源实现区域性发展。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陆续有研究学者如日本社会学家鹤见和子、日本学

者宫本宪一、保母武彦等从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不同学科视角对内生发展的概念、主要特征、理论框架等进行了深入研究,研究的重心也逐渐从关注“物”转向关注“人”,强调以人为本^[19],认为内生式发展的主体必须是区域内居民,通过居民的参与和地方政府的推动开展区域振兴活动,目的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人权的保障和生活质量的提升。

但是主要依靠内部自身努力而不依靠外部资源强调“自下而上”的内生式发展模式在突破“由上而下”的传统外生式发展模式的同时由于“过度反应”又陷入了另一种极端,从而在20世纪90年代掀起了一场关于内生发展理论脱离乡村发展实际的反思浪潮,在欧盟国家开始兴起“新内生发展”理论^[20]。英国纽卡斯尔大学教授克里斯托弗·雷(Christopher Ray)于2001年正式提出新内生发展概念。新内生发展理论融合了内生发展与外生发展两种理论,强调内外互动的混合动力模式,既注重当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居民的参与,又强调内外部资源共同作用,将外部干预转化为内部发展和建设的动力,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理念^[15]。目前对新内生发展理论的研究主要包括介绍新内生发展的相关概念内涵和理论特征,借鉴国外乡村内生发展模式的成功经验,乡村内生发展影响因素研究,中国乡村内生发展实践的案例分析,推动中国乡村内生发展的对策研究等。比如:张行发等(2021)^[15]基于新内生发展理论,探讨了贵州省Y县在社会力量帮扶下实现脱贫攻坚并向乡村振兴转化的新内生式发展动态过程,揭示了县域新内生式发展的路径和模式创新;吴越菲^[21]认为农村已经不再仅仅是与工业、服务业为主导的城市相对应的由农业部门管理的农业生产空间,而是一个包含了农业但又不仅仅是农业的,涉及自然环境保护、文化传承、消费和休闲等在内的更具后现代色彩的地域综合体。当代农村发展应该是一个“上下联动、内外合作”的“后生

产主义”新内生过程等。

综上,新内生发展理论是目前红色旅游与乡村振兴协同发展的最佳实践路径。而根植性理论提及的各种因素正是新内生发展理论中的内生发展因素。现有文献对根植性的类型及包含要素的研究结论并不统一。本文根据乡村特点,综合以上文献研究,将乡村内生发展因素归结为政治根植(包含社会制度、组织管理、社会关系等)、经济根植(包含资本、产业及产业结构、技术等)、文化根植(包含认知、传统文化、历史等)和地理根植(包含地理位置、自然资源等)四种。根植于自然资源、历史文化的乡村红色旅游属于乡村发展的一部分,必须与当地资源进行深度结合,才能共生共荣。

三、漳州红色旅游与乡村振兴协同发展建议

2016—2022年每年的中央一号文件、2022年4月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以及党的二十大报告等多份文件均要求各级人民政府要深入推进农村改革,采取措施激活、增强农村尤其是脱贫地区内生发展能力,建立农村低收入人口、欠发达地区帮扶长效机制,全面持续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推进乡村振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提出了乡村组织振兴、人才振兴、产业振兴、文化振兴和生态振兴“五个振兴”的科学论断。本次问卷调查以开放题的形式收集了受访者对漳州红色旅游景点保护、开发及与乡村振兴协同发展的意见、建议,回答基本集中在以下点:深入挖掘和开发、保护红色资源及做好生态保护;增强内容展示方式,增加年轻人喜好的互动游玩项目和体验感;加大宣传推广力度,树立品牌形象提升知名度;加大与周边区域红色旅游景点之间的联动,完善旅游线路;加强乡村基础及配套服务设施建设;让当地人多多参与;加强与

当地文化的融合,打造当地特色;加强红色旅游与乡村振兴,乡村振兴和乡村治理的协同发展;乡村振兴方式和途径多元化等方面。本文以“五个振兴”为理论框架融入以上意见、建议,探讨漳州红色旅游与乡村振兴协同发展的改善建议(图1)。

(一) 组织协同

政治根植性主要关注政策制度^[14]、组织管理、社会关系等。政策制度包括由政府政策、法律法规构成的正式制度和由民风民俗、民规民约构成的非正式制度对乡村发展的影响。组织协同一是要建立科学的组织管理体制。红色旅游景点和乡村振兴的相关负责部门要打破行政壁垒,统一协调,实行“党委领导、政府负责、部门协同、社会参与”的工作机制。二是要制定科学、规范的管理制度。完善的制度可以提供良好的招商引资环境,降低产业集聚的行为成本、沟通成本和交易成本^[10];有助于红色旅游景点的保护和跨区、跨县、跨市、跨省的合作开发;有助于红色旅游和乡村发展统一规划、深度融合;有助于培养本土人才和吸引外部优秀人才;有利于传统文化、红

色文化的传承和宣扬;有利于生态环境保护等。三是要确立村民在乡村治理中的主体地位。人的内生性是人的主体性、主导性的体现,是内生式发展的最直接动力^[20]。《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强调,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遵循“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增强农业农村自我发展动力”等。因此要重视培育和提升乡村居民参与乡村发展的能力,贯彻全过程人民民主,激发村民建设乡村的积极性、主动性,建立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治理共同体^[22]。

(二) 人才协同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人才作为第一资源,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23]。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培养造就大批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人才是国家和民族长远发展的大计。因此人才协同要作到以下几点。一是要建立、健全乡村人才工作体制机制,深化乡村人才培养、引进、管理、使用、流动、激励等制度改革,完善人才服务乡村激励机制。二是要积极吸引本地年轻人回流,解决因城镇化普及所造成的农村空心化问题;发挥农村乡贤、致富能手的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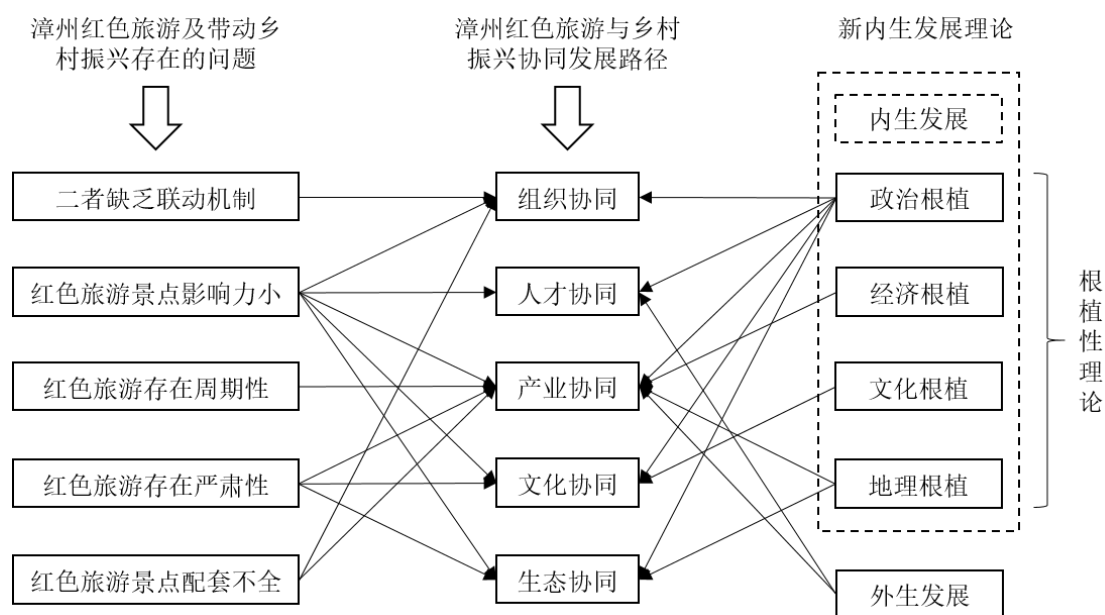


图1 漳州红色旅游与乡村振兴协同发展框架

范带头作用,带领村民一起发展;对村民进行职业技能、经营管理、信息技术等方面的培训,培养本土人才。三是引进外部优秀人才助力乡村建设,解决村民因为文化认知水平低、信息闭塞等不懂经营管理、不会使用现代信息技术等难题,帮助红色旅游景点进行保护和深度开发,引入智能技术打造深度体验旅游产品;加大红色旅游景区的资源整合和产品线上化^[24],提升红色旅游品牌形象以及促进红色旅游和乡村振兴一体化发展等。本次针对漳州红色文化了解渠道(多选题)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新媒体平台在传播漳州红色文化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占比达到74.61%;红色旅游景区、单位或学校红色主题教育也是受访者获取相关信息的重要途径,分别占比55.42%和52.32%;影视节目和广播电视也有一定比例,分别为30.03%和21.67%;书籍报刊和其他渠道的比例相对较低,分别为13.93%和4.95%。不过,在对漳州红色旅游景点对外的宣传方式上,62.85%的受访者表示了满意和非常满意,认为一般的占32.82%,而不满意和非常不满意的比例较低,合计为4.34%。

(三) 产业协同

经济根植性包括社会经济、资本、产业和产业结构及技术等。产业发展状况是衡量乡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产业兴旺是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和发展红色旅游的物质基础^[25]。当下中国情境下的乡村新内生式发展内涵应该是对本地优势资源充分利用,借助独特的地理环境、自然风貌等自然资源禀赋与现代的经济贸易方式相结合形成该地区的独特产业^[13]。因此产业协同应采取如下措施。一是要打破行政区划壁垒,推进区域乡村产业和红色旅游经济一体化发展,从地脉和文脉方面整合乡村和红色旅游资源,进而推进联动开发,加强乡村和红色旅游区域间的资源共享、线路对接、市场互动、客源互送和效益共赢,从而降低红色旅游开发成本、优化红色旅游资源要素配置

以及促进红色旅游资源整合^[26],形成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比如,湖南沙洲红色旅游景区覆盖的多个村党组织牵头成立了沙洲田园综合体农民专业合作社,通过委托经营、提供就业、入股分红等模式帮助村民顺利脱贫。二是各乡村要制定更多优惠政策,通过市场激励机制鼓励和吸引各类外部投资主体和民间资本参与当地乡村和红色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经营,完善城市生产要素下乡机制,构建多元化主体参与机制,建立起“政府+企业+乡村”的联合开发模式,建立乡村产业运营体系,实现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社会参与,弥补乡村发展的资金短板,用产业收入完善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助力红色旅游的保护和开发,再通过红色旅游为乡村吸引客流,实现协同发展。三是促进红色旅游与乡村观光农业、温泉养生、生态农业等其他产业的融合发展,构建多功能的乡村红色旅游,促进异质性产业要素的集聚整合与无障碍流通,进而实现红色旅游产业价值链的重塑与创新^[26]。比如湖南沙洲红色旅游景区引进湖南零级有机生态农业、深圳我在旅行国际旅行社等企业,做大做强旅游市场,鼓励村民通过种植、制作、销售特色水果、农副产品及发展民宿、农家乐等方式实现增收致富。

(四) 文化协同

内生发展是以文化为基础的发展。文化根植性主要指经历了长久的演化变迁最终形成的历史文化积淀,包括历史遗迹、宗教信仰、民俗风情、人文精神等,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和极强的生命力^[12]。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物质贫困不是社会主义,精神贫乏也不是社会主义。我们要不断厚植现代化的物质基础,不断夯实人民幸福生活的物质条件,同时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加强理想信念教育,传承中华文明,促进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23]”。本次对漳州红色旅游景点的红色文化教育效果进行调查,61.3%

的受访者选择了一般，满意和非常满意的占36.84%，不满意和非常不满意的占1.86%。因此搞好文化协同应从以下方面入手。一是要促进乡村精神文明建设。红色旅游集休闲娱乐、爱国主义教育、红色文化赓续于一身，有利于提升村民的家国情怀和时代使命感，引导人们向上向善，有助于涵养乡村公共品德，提高村民的思想道德修养，营造良好的社会风气和社会环境，打造积极友善团结向上的乡村共同体^[25]。二是要为村民提供参与红色旅游宣传的机会。借助村民对当地红色遗址、遗物和事迹等的了解，积极鼓励村民担任如红色故事讲述者、红色遗址守护者、红色文化传承者等角色。既能发挥传承和发扬当地红色文化的内群体作用，又能够为红色旅游提供人才资源；既能解决部分村民的就业问题，又能拉近村民与游客的距离，更有了解红色文化的兴趣等。本次对漳州红色旅游景点讲解人员的专业程度调查结果显示，78.33%的受访者表示满意和非常满意，19.2%的表示一般，仅有2.48%的受访者表示不满意或非常不满意。在对漳州红色旅游景点内的景点介绍方面，感到满意和非常满意的占49.53%，一般的占48.61%，不满意和非常不满意的占1.86%。三是要将当地民俗文化、宗教信仰、历史人文等与红色文化串联，既能将红色文化融入乡村旅游，又能延长游客的旅游时长，提高乡村的旅游价值，为乡村创造更多收益。本次问卷调查针对漳州红色旅游景点的红色文化与当地民族文化、民俗等融合情况，64.71%的受访者表示一般，满意和非常满意的占31.89%，不满意和非常不满意的占3.41%。

（五）生态协同

自然资源受地理区位限制，是地域特色中最原始的部分，也是最易被探寻的部分，具有不可移动的特性，天然地与当地的其他要素融为一体，是乡村地区最明显的根植性体现，对一个地区的发展有深远影响。自然资源包括生态景观资

源（自然形成的独特地形、地貌风光等）和土地、海河、森林、矿产资源等^[1]。自然资源丰富度愈高，其地理根植性就愈明显。自然禀赋模式中，经济发展对自然环境的依赖越强，根植性也就越强。地方既可以通过开发自然资源得到发展，也可能会因为自然环境遭到破坏而丧失发展的活力。本次对漳州红色旅游景点所处的生态环境保护和开发情况调查结果显示，64.4%的受访者表示一般，满意和非常满意的占33.43%，不满意和非常不满意的占2.17%。因此在自然禀赋模式中，首先要考虑的是保护当地的自然环境，做到绿色发展，主导产业的发展既要利用资源优势，又要保护当地的生态圈^[12]，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理念。乡村积极发展旅游、康养业，可以为红色旅游引流，克服单一红色旅游内容呆板、参观时间较短无法留住客人的不足，让游客既能在红色旅游景点接受红色文化教育，也能徜徉在青山绿水间陶冶心情，感受革命战士用生命和鲜血为我们换来的宁静和平，珍惜美好生活的来之不易，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维护国家安定团结。

结语

新内生发展扎根于本土，以提高当地民众的生活质量为宗旨，不仅承认地方在农村发展中的主体性地位，尊重地方特有的价值体系和文化传统，基于当地的自然与文化资源发掘内部潜力，也将人才、资金、技术、品牌等外部资源视为农村发展可资利用的要素，是农村经济、社会、人文、生态的综合性发展。红色旅游景点很多是与乡村当地的自然资源或者历史建筑有关，无论是从资源还是文化角度都仅属于乡村资源的一部分，应和乡村振兴相互牵引、相辅相成、互利互惠。

从本次问卷调查结果看，漳州市红色旅游作出了一定的成绩，所有项目非常不满意的占比均

未超过1%，不满意和非常不满意的合计占比除“红色旅游景点与当地产业融合情况”为5.57%外，其他项目均未超过5%。在漳州红色旅游景点交通条件、宣传方式、宣传内容、讲解人员的专业程度、服务态度等方面受访者的满意程度都很高，非常满意和满意合计比例均超过50%，分别为69.66%、62.85%、54.80%、78.33%和68.12%，尤其是讲解人员的专业程度和红色旅游景点的服务态度，非常满意程度占比分别高达22.91%和18.89%，远远超过其他调查项目只有个位数且最高只有6.81%的比例。但是在停车条件、线路指示、景点介绍、内容展示方式、餐饮、住宿、公厕配套设施、卫生状况、红色文化教育效果、周边产品开发情况、与当地产业融合情况、红色文化与当地民族文化及民俗等融合情况、生态环境保护和开发、和周边景点联动情况等方面还存在改善的空间，这些项目满意程度一般以下（含一般、不满意、非常不满意）均超过50%，分别为58.21%、52.01%、50.47%、56.35%、69.04%、70.28%、65.64%、58.83%、63.16%、67.81%、70.28%、68.12%、66.57%、71.20%，受访者在红色旅游景点推动乡村振兴工作方面认为效果不明显和不了解的占63.77%。所以红色旅游景点和所在乡村都要积极主动寻求融合，打造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的高质量发展共同体，实现中国乡村振兴战略“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

参考文献

- [1]吴若山.红色旅游发展的“破”与“立”[J].旅游学刊, 2021, 36(6):1-3.
- [2]符涛.红色旅游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以海南省为例[J].社会科学家, 2019(10):104-109.
- [3]古志强,古晓琳.活化红色档案资源助推苏区乡村振兴[J].中国档案, 2021(10):28-29.
- [4]付璐.体验导向型红色旅游开发问题探讨[J].社会科学家,

2020(9):40-44.

- [5]朱丽,李美.游客需求视角下的乡村红色旅游发展困境及应对[J].农业经济, 2020(3):48-50.
- [6]戴斌,马晓芬.大力推进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思考[J].湖南社会科学, 2021(4):77-85.
- [7]陈金华,李宇靖.“海丝”重点侨乡旅游经济联系网络结构演化[J].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5):45-56.
- [8]伏恬舒.红色旅游与乡村振兴耦合发展路径探索:以汝城沙洲村为例[J].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16(2):132-138.
- [9]罗景峰,安虹.红色旅游沉浸体验的发生机制及意义建构逻辑:基于双系统理论的视角[J].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5):40-53.
- [10]陈晓敏,袁波,张海熔,等.文旅产业的地域根植性:以成都市龙泉驿区洛带镇为例[J].成都行政学院学报, 2019(1):91-96.
- [11]王佳琪,袁永博,张明媛.基于根植性理论的特色小城镇产业规划研究:以辽宁省庄河市大郑镇为例[J].小城镇建设, 2018, 36(12):32-38+44.
- [12]付晓东,蒋雅伟.基于根植性视角的我国特色小镇发展模式探讨[J].中国软科学, 2017(8):102-111.
- [13]范斌.基于根植性理论视角下的我国体育特色小镇建设机制研究[J].体育与科学, 2018, 39(1):84-89.
- [14]郭磊.基于根植性理论的特色小镇创新发展研究:以苏绣小镇为例[J].长江技术经济, 2022, 6(5):96-101.
- [15]张行发,徐虹,张妍.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新内生发展理论视角:以贵州省Y县为案例[J].当代经济管理, 2021, 43(10):31-39.
- [16]邱浩钧,刘雪梅.共同富裕目标下乡村内生发展的实践逻辑与优化策略:基于浙江实践的多案例研究[J].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 2023(4):28-38.
- [17]马海龙,杨玟玟.新内生发展理论视阈下乡村特色产业发展的动力整合:以东北地区J村木耳产业为例[J].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 2023, 15(4):64-77+154-155.
- [18]章志敏,张文明.农村内生发展研究的理论转向、命题与挑战[J].江汉学术, 2021, 40(2):5-15.
- [19]包先康.区域内生发展下连片贫困区精准扶贫的质量提升[J].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 21(1):105-111.
- [20]张秋菊,张超锋.农村内生式发展的理论和政策实践:以日本中山间地区等直接补助制度为例[J].世界农业, 2020(11):20-28+143.

- [21]吴越菲.从部门生产到区域繁荣:面向农村新内生发展的政策转型及其反思[J].贵州社会科学,2022(5):158-168.
- [22]王维国,刘亚宁.共同体视域下农村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J].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4,22(2):60-69.
- [23]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EB/OL].(2022-10-25)[2023-11-09].https://www.gov.cn/xinwen/2022-10/25/content_5721685.htm.
- [24]罗利玉.红色旅游发展的基本遵循与现实进阶:基于乡村振兴战略的解读[J].社会科学家,2021(7):46-50.
- [25]刘玉珂,胡笑笑.湖南省红色资源赋能乡村振兴的多维价值与路径优化[J].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36(6):120-127.
- [26]杨勇,邹永广,吴煜灵.红色旅游区旅游经济联系网络结构与格局演进:以湘赣闽红色旅游区为例[J].福建农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25(5):78-87+112.
- (责任编辑:耿惠斌)

Research on the Synergistic Development of Red Tourism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Take Zhangzhou City as an Example

YUAN Zhigang, LIU Cang

(Xiamen University Tan Kah Kee College, Zhangzhou 363105, China)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red tourism has made great contributions to the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areas. However, due to the large number of red resources and wide distribution, many red tourist attractions in remote areas with low visibility have not played an obvious role in collaborative development with rural revitalization. Taking Zhangzhou City as an example, the paper combines literature research and questionnaire survey results to find that the rural red tourist attractions have problems such as multiple management, small influence, cyclical travel time, serious contents, and insufficient supporting service facilities. Therefore, collaborative development of red tourism with rural revitalization should not merely rely on one-way “red+”, but should combine “red+” and “+red”. Based on the rooted theory and the new endogenous development theory, with endogenous development “blood-forming” mechanism as the main, and exogenous development “blood transfusion” mechanism as a supplement. According to the rural “five revitalizations” development framework, the red tourism should be integrated into rural development to achieve “industrial prosperity, ecological livability, rural civilization, effective governance and rich life” in rural areas in China through organizational collaboration, talents collaboration, industrial collaboration, cultural collaboration and ecological collaboration, .

Key Words: Zhangzhou; Red tourism; Rural revitalization; Embeddedness; New and endogenous development